

毛泽东国际战略的转换及其逻辑分析

2004-12-29 贾江华 阅读1263次

毛泽东是举世闻名的战略家,在领导党和人民缔造并建设新中国的进程中,他根据世界各种矛盾对比、政治力量调整及国际格局态势的变化,根据中国的历史和现状,提出了一系列变化的国际战略思想。这些思想直接指导了我国国家建设的设计、外交方针和政策的制定以及具体外交实践。分析这些思想转换的逻辑与方法,将对我们新的国际战略和策略的制定,有着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国际关系理论形态转换:从中间地带理论到三个世界理论

中国共产党通过革命根据地建设和抗日战争取得胜利,人民的力量逐步取得稳定和发展后,毛泽东经过对抗日战争后美苏对峙格局的形成、以及美苏对中国关系的不同态度的分析,特别是通过对美国的对待国共双方不断变化的方式的分析,开始以中共建立起的代表人民利益的国民政府为基础,从民族利益的角度,独立而现实地思考国际问题和中共的国际战略。

毛泽东对国际局势和国际矛盾的转换的关注,是他从青年时期感慨国力孱弱、民族国家备受欺凌而寻求救国救民之道路,探索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问题开始的,但这一时间只是思想主义的成分多,缺乏现实的力量依托。而只有中共经过大革命、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力量不断强大,对建立代表最广大人们利益的民族国家的诉求越来越强烈而真实的时候,才凸显对国际环境辩证处理的迫切要求。从民族国家民族利益的角度分析国际矛盾问题而形成的国际关系理论,也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

第一,从中间地带理论到两个中间地带。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战略格局呈现两极对峙。中国的抗日战争结束,国内则出现国共矛盾对立。中国内战爆发之后,苏联在中国问题上奉行妥协路线。1946年8月,毛泽东提出对国际问题的看法,是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著名谈话。这篇文章的锋芒直指美国帝国主义的反动派行径。毛泽东在谈话中科学地分析了战后国际格局,提醒人们注意在冷战对立的两极之间处于游离状态的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中间地带。“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1)毛泽东指出:“美国反动派说,他们在世界各地已经建立和准备建立的一切军事基地,都是为着反对苏联的。不错,这些军事基地是指向苏联。但是,在现时,首先受到美国侵略的不是苏联,而是这些被建立军事基地的国家。我相信,不要很久,这些国家将会认识到真正压迫它们的是谁,是苏联还是美国。美国反动派终有一天将会发现他们自己是处在全世界人民的反对中。”(2)

显然,从民族国家对反对殖民地政策与控制看,这是一个富于远见卓识的战略预见。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有两个引入注目的变化,一是在1955年4月召开的万隆会议的鼓舞下,亚非拉美的民族独立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进入了新阶段,团结合作进一步增强,涌现出一大批新独立的中小国家。二是在两大阵营内部,都开始出现离心和分化的倾向。广大中间地带迅速崛起。而美苏两国争夺的重点,也正是在包括欧洲在内的广大中间地带。于是中间地带理论一直是毛泽东观察分析国际问题、制定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到1956年10月,毛泽东在会见巴基斯坦总理苏瓦拉底时指出:中间地带包括从英国一直到拉丁美洲。这个地区的一边是社会主义阵营,另一边是美国。这个地带最多的人口和最多的国家,包括有三种性质的国家。第一类是拥有殖民地的帝国主义国家,如英国、法国;第二类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国家,有的已经取得民族解放,有的还在争取民族解放;第三类是在欧洲的不拥有殖民地的自由国家。他认为要认识中间地带的重要性,用和平方法解决中间地带国家之间的一些内部纠纷,扩大和平和

正义的力量。在后来的一些谈话中,毛泽东还指出利用民族主义力量的意义,他提出:“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帝国主义,这三个主义中,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比较接近。而民族主义占领的地方相当宽,有三个洲:一个亚洲,一个非洲,一个拉丁美洲。”(3) 据此,毛泽东和周恩来共同确定了中国外交的重点是在亚非拉美国家中广交朋友,同时也积极争取同英、法等西方国家改善关系。

20世纪60年代末期中苏论战和中苏关系恶化后,中国成为独树一帜的国际力量,这是战后世界格局发生的影响最为深远的重大事件之一。与此同时,以法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同美国的裂痕也日益扩大,矛盾趋于表面化。这样,民族独立和两大阵营的分化三种力量汇为一体。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进一步发展了中间地带理论,提出了存在着两个中间地带的论断。1963年9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我看中间地带有两个,一个是亚、非、拉,一个是欧洲。日本、加拿大、法国对美国是不满意的。苏联与东欧各国的矛盾明显发展。情况还在发展,矛盾还在暴露、关系进一步紧张。随后,毛泽东在1964年2月5日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谈话时再次阐明关于两个中间地带的观点。他说:“讲到中间地带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指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经济落后的国家,一部分是指以欧洲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两部分都反对美国的控制。在东欧各国则发生反对苏联控制的问题。这种情况看起来比较明显。”(4)

从中间地带理论到两个中间地带理论,深刻地反映了战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国际地位提高与世界格局的调整,表明毛泽东基于民族国家利益问题上的国际关系理论不断丰富和完善。

第二,从中间地带理论到三个世界理论。其实,在毛泽东分析中间地带理论的时期,毛泽东就开始使用“第三世界”这个概念,来代表他所说的“中间地带”。1964年1月17日,毛泽东会见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等外国朋友。毛泽东在谈话中说:美国现在在两个“第三世界”都遇到抵抗。第一个“第三世界”是指亚、非、拉。第二个“第三世界”是指以西欧为主的一批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有些还是帝国主义的国家,这些国家一方面压迫别人,另一方面又受美国压迫,同美国有矛盾。他还说:“不能设想,美国只在两个‘第三世界’遇到抵抗,而独独在苏联和东欧会不遇到抵抗。”(5) 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毛泽东酝酿已久。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专门谈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问题:“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美国、苏联原子弹多,也比较富。第二世界,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原子弹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富;但是比第三世界要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6) 同年4月10日,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大会上发言,全面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邓小平在发言中指出:从国际关系的变化看,现在的世界实际上存在着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着的三个方面、三个世界。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国际斗争的主题是反对霸权主义。他还郑重声明: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最主要的动因,是要在急剧变动的世界格局中,为中国找到一个与国力和国家利益相符合的战略地位,即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在这方面,中国的确获得了最大的战略利益。最直接的收获,就是中美关系的正常化,中国国际战略地位的提高,以及中国外交新格局的出现。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提出,一方面表明,中国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方针开始超越意识形态的局限,走上以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为最高原则的务实轨道。另一方面,这个理论的提出,也是对剧烈变动、改组中的国际局势进行深入观察和思考的结果。

二、国家整体外交策略转换:从“一边倒”到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

有什么样的战略,就有相应的策略与方针政策与之对应。根据时局的变化和观察点的调整中国的外交战线,也有一个变换的历程。这就是从“一边倒”单向度到完整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

第一阶段,创立自己的外交路线。从鸦片战争起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一百多年间,我国的主权和领土一直遭到帝国主义列强的粗暴侵犯和任意宰割。而整个旧中国的外交包括国民党政府走的是一条屈辱外交的路线。毛泽东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把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正确结合起来,毅然

决定破旧立新,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型外交。他在新政协筹备会上明确宣布: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毛泽东用非常生动的语言,为新中国的外交提出了“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方针。

第二阶段,联苏抗美的“一边倒”策略。鉴于中苏美英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合作背景,中国共产党曾一度真诚希望各抗日盟国、尤其是美国能帮助中国避免内战,促进战后中国的和平民主建设,然而,这种愿望很快被美国采取的扶蒋反共政策所打消。而基于中国与美苏的实际关系,要获得强有力的国际援助,必须表示明朗的外交态度,根据新中国安全和建设所提出的客观要求,决定了新中国外交战略上的倾向性,必然是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应当说,这个阶段,政治信仰和社会制度上的倾向性也有很大的原因。

第三阶段,提出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反帝、反修”统一战线。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毛泽东根据变化的国际格局,即美国仍继续推行其敌视中国的政策,苏联不尊重中国主权走向对抗,不断对中国施加种种压力,致使意识形态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中苏之间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日趋激烈。毛泽东逐步改变联苏抗美的“一边倒”的国际战略,提出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反帝、反修”统一战线的国际战略。

第四阶段,联美遏苏的“一条线”和“一大片”策略。毛泽东根据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苏战略态势和中美苏三国关系的变化,逐步形成了三个世界理论和相应的中国外交策略。1973年2月17日,毛泽东在会见美国基辛格博士时,提出“一条线”的思想。所谓“一条线”是指从中国、日本经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到美国都在这条线上。1974年1月5日毛泽东在会见日本外务大臣大平正芳时,又提出“一大片”的思想。“一大片”是指这条线周围的所有的国家。“一条线”和“一大片”的思想是毛泽东新的国际战略思想。其主旨就是要团结这“一条线”和“一大片”中的所有国家,即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反对苏联霸权主义。“一条线”、“一大片”的国际战略的实施,对于建立国际斗争新格局,促进中国同更多的国家建立和发展外交关系,改善中国的国际环境,提高中国的国际威望,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在这一时期,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结束了中美两国二十多年的敌对状态;与日本正式建交;几乎改善了同所有西方国家的关系;继续发展了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友好合作。可以说整个20世纪70年代,是中国外交大踏步前进的时期。

综上所述,外交策略要服从于国际战略,外交政策服从于时局的变化。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中国领导人,始终坚持的是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创建的新型外交的思想。在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上,毛泽东一贯主张,国家无论大小、贫富、强弱,都应当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友好相处,各个国家的事情应当由各个国家的人民自己去管,任何外国无权干涉,这是新中国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由来和主要依据。由此出发,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一切国家的关系就成为新中国外交的一项基本准则。

三、国际战略转换的逻辑分析

毛泽东观察和分析国际矛盾变化而发展了国际战略理论,从而指导了中国的对外关系的实践,打破了西方的封锁和包围,顶住了霸权主义的巨大压力,维护了国家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使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社会牢牢站稳了脚跟,逐渐壮大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国际和平力量。这其中有深刻的思想逻辑方法值得我们研究和分析。简单说来,毛泽东的国际战略逻辑运用了实事求是的矛盾分析的方法,实现了视角点的从理想主义到现实主义转换。

第一,国际关系理论从理想主义到现实主义。毛泽东早期就开始关注国际问题,形成了初步的国际战略思想。而从那时起直到“一边倒”外交政策这一段时期,“世界主义”、“民众大联合”、“和平正义”、“反帝反霸”、“反殖民主义”等等词语是构架毛泽东国际问题思路的基本单元,从国际道义与正义、普遍的尺度、制度或者价值观等等意识形态,或者按照世界“应然”的关系和秩序出发来剖析国际矛盾,突出地表现为理想主义。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末期,第三世界民族国家纷纷崛起和中苏交恶,毛泽东的国际关系理论开始了以民族利益、国家利益、国家主权、国家权力为基础的现实着眼点的转换经过独立自主地创立和平共处原则,扩大了国际交往的范围和深度,恢复了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地位,同

历史上的老侵略者日本和世界霸权国家之一的美国都建立外交关系,对外战略的思考全面转型为国家现实利益的现实主义。现实主义把国家主权、国家利益、国家权力——国家实体、经济贸易能力、工业能力、军事能力等等综合国力、地缘政治(生存空间)纳入思考国家间关系的基本要素。因此,毛泽东三个世界的国际关系理论成熟后,特别是指出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中国不结盟不称霸后,已经实现了向现实主义的全面转换。

第二,国际战略转换的方法论:实事求是基础上的矛盾分析方法及矛盾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结合。首先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观察和分析形势,并根据变化了的情况制定正确对策的思想方法。毛泽东在20世纪70年代不再固守那种以社会制度和阶级属性为标准划分世界政治力量的思想方法,所以能对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后的世界形势作出清醒的、正确的判断,从而概括出三个世界的战略构想。三个世界划分战略思想的提出,再一次体现了毛泽东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其次是利用矛盾的两点论与重点论的区分与结合,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表现在认识和处理国际矛盾体系时候要争取多数,孤立少数,集中打击最主要的敌人的策略方针。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又一次体现了毛泽东在长期对敌斗争中形成的这一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在当时世界存在的多种矛盾中,毛泽东准确地抓住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同世界各国人民的矛盾;同时又深刻地洞察到美苏两霸之间存在着尖锐矛盾,以及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采取攻势的苏联。从而使国际反霸统一战线对依靠谁、联合谁、打击谁,有了明确的策略方针。由于这一方针的贯彻,有效地粉碎了超级大国主宰世界的企图,壮大了维护和平的力量,制约了战争危险的增长。这一成功的实践再次证明,任何敌对势力,不论多么强大,都不会是铁板一块,总有矛盾可以利用;任何中间势力不论多么动摇,都可以也应当努力争取;作为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先进政党,不论任何时候,都应该坚持依靠进步力量,争取尽可能多的同盟者,尽量缩小自己的对立面。这一点,在今天的国际斗争中仍然有着现实意义。最后,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全面反映出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相统一的辩证法原则。在国际关系中坚持自己的基本利益和特殊需要,不拿原则作交易,这是坚持了中国的特殊个性,同时与不同制度的国家和民族求同存异,共同发展,是兼顾共性。这种灵活而务实的对外关系,使中国在世界的朋友越来越多了,到20世纪70年代末,和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已经有一百一十多个了,并且开展了广泛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往来。这些成就为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此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以及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继承了毛泽东国际战略的理论成果,并结合时代特征、历史依据和现实国情,运用毛泽东思考国际战略的正确方法,在新的历史时期发展了中国的国际战略理论和对外策略,形成了新的理论形态,为国家的稳定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综上所述,毛泽东的国际战略思想是一个随着历史发展而自身不断丰富的理论,国家民族生存、兴旺、发达是这一理论的支撑点,实事求是基础上的矛盾分析方法构成了贯穿其中的灵魂。

贾江华,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博士

来源:《毛泽东思想研究》2004年第3期

网站编辑:宋扬

[关于我们](#) | [服务范围](#) | [网站合作](#) | [版权声明](#) | [网站地图](#)

Copyright ©2007 All rights reserved Sichuan Social Science Online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信息网络中心设计制作

mail: sss@sss.net.cn

蜀ICP备05003527号